

17 DEC 1934

444

獨立評論

第一三一號
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下為限）代洋，不打折扣。

棉紗統稅應改訂等級
汪蔣通電裏提起的自由
我們對政治應取的態度
論走直道兒
解決中國經濟問題應走的路
雙週閑談（五）
編輯後記

王子建
胡適
張佛泉
壽生
賀嶽僧
明生
適之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西單商場 大學出版社 業所 君中書社 廣益書社 社 青年書社 光明書社 知行書社 榮華書社 安市場 廣文堂(代定) 景華書社 福祥書社 侯 記書社 米市大街 文心 書業社 宣內 佩文齋 廠甸 現代書局 昆雲堂	天津	法租界 海運會 朝野書店 法租界 廣文堂(代定) 南開大學 天津書局 文元書局 大生書局 博古書局 現代書局(總代售及代定)	上海	福州路 生活書店 亞里圖 光華書局 新中國 書局	南京	新中華書店 南新書社 花牌樓書店(代定) 鐘山 書局 正中書局 中央書 局 大中書局 天一書店 鎮江書店 蘇州廣告社	鎮江	三友書店(代定)	南通	振華書局	常州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	大衆書局	生活書店																																																																
武昌	新生圖書公司 廣益書局 新光書局 南昌書局 振興書店 廣州 現代書局(代定) 圖書清	汕頭	大東書局	廈門	興華書局 新民書店	梧州	文淵書局 黃祥和堂	桂林	東方書局	柳州	中華書局 廣文書局 青島書局 春武書社	濟南	甘一小學社 中華書局 廿一小學社	安東	世界書局	青島	世界書局	煙台	世界書局	濰縣	世界書局	日照	世界書局	徐州	世界書局	開封	世界書局	鄭州	世界書局	保定	世界書局	石家莊	世界書局	張家口	世界書局	歸綏	世界書局	包頭	世界書局	太原	世界書局	西安	世界書局	蘭州	世界書局	西寧	世界書局	成都	世界書局	重慶	世界書局	萬縣	世界書局	宜昌	世界書局	沙市	世界書局	漢口	世界書局	蕪湖	世界書局	南京	世界書局	蘇州	世界書局	杭州	世界書局	福州	世界書局	廈門	世界書局	汕頭	世界書局	廣州	世界書局	香港	世界書局	澳門	世界書局

北平：平北門後慈懸殿北牙胡同二號 電話：東一局〇五六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登記證：警字六六一號，中字八二一號

棉紗統稅應改訂等級

王子建

自上月間稅務署表示將加徵棉紗統稅後，各地紗廠紛起反對，華商紗廠聯合會且派遺代表進京請願。迄今月餘尚未得適當解決辦法，事態似其嚴重。其實此事內情，極為明顯：在財政當局，不過希望增加稅收，以裕國庫；在紗廠方面，當然最好希望不要增稅，即不得已而不能不增，亦希望趁此機會把稅率等等重新改訂，以求負擔之公允。其所以遷延而不能決者，蓋以有外廠關係，政府未能遽自決定方針故也。雖然，為全國工業前途計，吾人對於紗廠方面所提改訂統稅等級，在原則上實深可同情，請申論之。

查棉紗統稅之制，創自二十年二月。當時立法院議訂統稅條例，原擬根據國內生產實況，將稅率分為三級，即十七支以下為一級，十七支至二十三支為二級，二十三支以上為一級。後因外廠反對，遂決定為粗細兩級，以二十三支為界；二十三支以下者謂之粗紗，二十三支以上者謂之細紗。其稅率，以一百斤計，粗紗課國幣二元七角五分，細紗課國幣三元七角五分；每包紗以三百二十斤折算，

粗紗實課國幣八元五角八分，細紗實課國幣十一元六角三分。此種分級辦法，對於外廠較為有利，因外廠所紡紗支較華廠為細；細紗售價有較粗紗超過二三百元者，而稅率之差別不過四元。故表面上華商與外商所受之待遇雖同，實際上華廠所負稅額實遠過於外廠。當此全國經濟破產，華廠岌岌可危之時，廠商豈堪再負此種不平的負擔？此所以華廠屢有改訂稅級之議也。

即令退一步言，姑認華廠與外廠所紡支數平均相若，然而廠與廠間所紡的支數決不能盡同，尤以上海廠家與內地廠家相差更為懸殊。現行稅率既失之權統，各廠負擔遂難得公允，自有背課稅公平之原則。故華商紗廠聯合會呈中央洽電中稱：「政府為裕國庫收入而增稅，似應按照徵稅原理，求其平衡負擔，擇應增者增，應減者仍應照減。例如四支棉紗售價在一百元左右，而與一百七十八元之二十支棉紗同列一級，徵收八元五角八分之重稅；而價值四百餘元之六十支細紗，反與價值二百三四十元之三十二支細紗同列一級，徵收十一元六角三分之輕稅，其負擔之不

均如此。」個中之言，自係實情，政府修訂稅率，誠不可不加以注意。

日前華廠紡紗支數，據某學術研究機關之實地調查，上海各廠以紡二十支爲中心；其他長江一帶的口岸及內地各廠紡十支，十二支，十六支，二十支四種，平均爲十六支；華北各廠紡十支，十六支，二十支三種，平均亦爲十六支。總言之，現時華廠紡紗中心約分十支，十二支，十六支，二十支四種；三十二支及四十二支雖亦間有紡出，但爲量甚少；至六十支則僅有一二廠家能紡，更不足論；十支以下尙有四支五支等極粗之粗紗，此乃利用廢棉紡成。現我國專紡廢棉之紗廠亦三家，普通紗廠間有兼紡者。日商紗廠之紡紗則約分十六支，二十支，三十二支，四十二支四種，最高有紡八十支者。爲求稅課負擔之公平，吾人主張依據上述實況，重新釐訂稅率等級。按現行關稅，進口棉紗分五級徵稅，即「不過十七支」「過十七支不過二十三支」「過二十三支不過三十五支」「過三十五支

不過四十五支」「過四十五支」等五級，蓋即依據十六支，二十支，三十二支，四十二支爲中心而分別爲課稅之標準，頗足借鏡。惟十七支以下之一級，仍嫌籠統，因十支及十二支既不能與十六支同其待遇，而廢棉所紡之四支紗更不能與十支或十二支者相提並論。根據實際情形，吾人以爲現行關稅之制可供作改訂統稅稅率的藍本，但須將十七支以下者更折爲「不過八支」「過八支不過十三支」「過十三支不過十七支」三級，而削爲七級之制。如此則各得其平，爭執糾紛，庶幾可免。華廠聯合會亦曾建議政府，參照海關稅級改訂爲四級制，其原則適與吾人觀察相吻合，但辦法尙不及七級制之澈底耳。

總之，政府求稅收的增加以裕國庫，固爲目前不得已之舉；吾人未便非議。但爲保護華商紗廠及維持納稅的公平計，似應將現行稅加以改訂，使應增者增，應減者減，而成一合理的稅制。此非但關係于紡織工業自身，即國家整個國民經濟前途，實利賴之，願政府當局特致意焉。

汪蔣通電裏提起的自由

胡適

十一月二十七日汪蔣兩先生聯名通電全國，說明他們

所要想向五中全會建議以期採納而見實行的主張，其中

共有兩大原則：一是明定中央與地方的權限，一是聲明「國內問題取決於政治，不取決於武力」。

關於第一項，原電文內列舉了五項子目，這五項如果能實行，應該可以做到「中央與地方之扞隔必日臻消融」的希望。

關於第二項，原電文內沒有具體的方案，只提出了一條很重要的原則：

人民及社會團體間，依法享有言論結社之自由。但使不以武力及暴動為背景，則政府必當予以保障而不加以防制，

又加上了一句說明：

蓋以黨治國固為我人不易之主張，然其道當在以主義為準繩，納全國國民於整個國策之下，為救國建國而努力，決不顧徒毀一黨專政之虛名，強為形式上之整齊劃一，而限制國民思想之發展，至反失訓政保育之精神。

又加上了一句總說明：

蓋中國今日之環境與時代，實無產生意俄政制之必要與可能也。

我們對於這個原則，當然是完全贊成的。因為原電文沒有

詳述施行的辦法，所以我們把我們想得到的辦法寫幾條出來，供汪蔣兩先生的考慮：

第一，政府應該明令全國，凡「不以武力及暴動為背景」的結社與言論，均當予以保障而不加以防制。原電文用「不以武力及暴動為背景」一語，比憲法草案裏用的「依法」和「非依法律」一類字樣，清楚多了。但「背景」二字也頗含混，也需要一種更明確的解釋。試舉個極端的例：假如十來個青年學生組織一個社會主義研究會，或者組織一個青年團來試行他們「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生活，這都應該可以享受法律的保障的，都不應該讓熱心過度的警察偵探曲解為「以幾千里外某地的紅軍為背景」！最好是索性不用「背景」一類容易誤解的字樣，而用「方法」或「手段」來替代，那就更合理了。

第二，政府應該明令中央與各省的司法機關從速組織委員會來清理全國的政治犯，結束一切證據不充分的案件，釋放一切因思想或言論犯罪的囚徒；並且應該明令一切黨政軍機關不得因思想言論逮捕拘禁人民。肯思想的青年，不滿意於政治社會的現狀，容易受一個時代的激烈思潮的誘惑，這都是很自然的現狀。不如此，就算不得有血氣的青年了。法國的「老虎」政治家克利蒙梭曾說：「一個少

年人到了二十歲不做無政府黨，是個沒出息的東西。可是若到了三十歲還是無政府黨，那就更沒出息了！」他那時代的激烈思想是無政府主義；若在今日，也許他要換上馬克思主義了。少年人應該東西撞，四面摸索，自己尋出他安身立命的思想。偶然跌一兩交，落到某種陷坑裏去，也算不得大不幸的事。撞了壁，他可以走回頭；落了坑，他可以增長見識與經驗。這樣自由摸索出來的思想信仰，才夠得上安身立命的資格。最靠不住的是重重保護之下長大起來的青年人，好比從沒出過繡房的千金小姐，一旦到了大世界裏，見個白臉小夥子對她一笑，就失魂落魄的害起單相思來了。今日許多因思想言論，（可憐呵！小孩子的思想，小孩子的言論！）而受逮捕拘禁的青年人，實在太多了。當局的人實在不明白腳鐐手銬和平獄生活決不是改善青年思想的工具。青年人嫌政治不好，你却拿腳鐐手銬等等來證明政治實在不好。青年人嫌法律不好，你却拿軍法審判糊塗證據等等來證明法律的確不好。青年人愛充好漢，你却真叫他們做好漢！我們參觀過北平好幾處的監獄和反省院，不能不感覺今日有徹底大清理全國政治犯的迫切需要。這件事不可以再緩了。

第三，政府應該即日禁止公安與司法機關以外的一切

機關隨意逮捕拘押人民。以我們所見所聞，我們簡直數不清中國今日究竟有多少機關可以行使搜查，逮捕，拘押，審訊的權力！汪蔣兩先生通電發出的前後幾天，北平一處就發生了無制軛無公文的人員到北京大學東發搜查並在路上拘捕學生的事，和清華大學文學院長在辦公室裏被無公文的人員拿出手槍來逮捕，並用手銬押送到保定行營的事。這種辦法也許可以多捉幾個人，可是同時也是努力替政府結怨於人民，使人民怨恨政府，怨恨黨部。

第四，政府應該明令取消一切箝制報紙言論與新聞的機關。報紙與雜誌既須正式登記立案，取得了出版發行的權利了，政府至少應該相信他們自己能負責任。他們的新聞有錯誤，政府可以命令他們更正；言論有失當，政府與黨部可以駁正。今日種種檢查審查的制度實在是瑣碎而不必要的。至於因為一條兩條新聞或一篇兩篇社評的不合某人的脾胃而就執行停止郵寄，或拘捕記者，或封禁報館，——這種事件實在是把一個現代政府自己降低到和舊日張宗昌一輩人的政府做同輩，即使真能做人人敢怒而不敢言的快意境界，快意則快意矣，於國家人民的福利，於政府的聲望，究竟有一絲一毫的裨補嗎？今日政府領袖既揭起言論自由的新旗幟來了，我們盼望第一件實行的就是一

切言論統制的取消。

第五，領袖諸公應該早日停止一切「統制文化」的迷夢。汪蔣兩先生已宣言不願「限制國民思想之發展」了。但今日有一些人還在高唱「統制文化」的口號。可憐今日的中國有多少文化可以統制？又有多少專家配做「統制文化」的事？在這個文化落後的國家，應該努力鼓勵一切聰明才智之士依他們的天才和學力創造種種方面的文化，千萬不要把有限的精力誤用到消極的制裁壓抑上去。試舉文學藝術做個例。有人說：「凡挑動階級鬭爭的感情的文學藝術都應該禁止」；並且有許多小說和某些電影片已因此被禁止或被刪削了。如果這個見解是對的，那麼，杜甫的名句「朱門

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也該挖板焚毀了！詩經裏「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一類的名句也該禁止發行了！亞聖孟夫子的「庖有肥肉，廄有肥馬，野有餓殍」也該毀板禁止了！舉此一例，可見「文化統制」不是可以輕易談或做的事。我們此時還不會夢見現代文化是個什麼樣子；拚命的多方面的發展，還怕趕不出什麼文化來。若再容許一些無知妄人去挑剔壓抑，文化就許真不上咱們門上來了！

以上五事，不過是隨便想出的幾種具體事項，來充實汪蔣兩先生的大原則。可是這些具體事項若不能做到，他們的原則就難呀我們信仰了。

(十二月九日大公報星期論文)

我們對於政治應取的態度

張佛泉

自從九一八國難以來，國民黨遊政于民的呼聲日高一。國難會議開過了。憲法草案公佈了。五中全會開幕之前，政治軍事領袖汪蔣兩公在十一月廿七日通電中曾說到：「決不願徒費一黨專政之虛名，強為形式上之整齊劃一，而限制國民思想之發展，致反失訓政保育之精神。蓋中國今日之振奮與時代，實無產生義俄政制之必要與可能也

。」所以我們可以說，德謨克拉西的力量，在被許多講時髦的人所唾棄的時候，居然又漸漸佔得優越的地位了。

政體類型的改換，與其說是可喜，無寧說是可悲。改換新體也許是新時代的開始，然而却多半代表舊企圖的失敗，今後我們採用較近自由主義的政制，究竟能否有滿意的成績，還要看我們努力的程度如何。但是我們急于在這

裏指出一件事。這件事如不能做到，則一切現代政治全不容易在中國樹立起來。這件事是甚麼呢？便是：國民對於政治應痛改傳統的態度！

我們現在將這一個觀點分爲三層來講。

第一，國民對政治的消極態度應即改爲積極的態度。這是現代政治的最基本的條件。既講「民」治，「民」必先肯治，必先願治。國民在民治政體下，對政治絕對不能消極，絕對不能憎惡；若消極，憎惡，便無民治可言！現代政治完全是以國民政治熱情爲泉源的。祇有由國民的熱情中才能湧出現代政治來！直接民治需要國民的熱烈支持，代表政治需要國民的熱烈支持，專政政治更需要國民！至少是一部有推動力量的國民！的熱烈支持！國民對政治的態度之於政治自身，猶如空中的溫度之於寒暑表。國民政治態度積極，方有生動的政治；空中的溫度力高大，寒暑表才能上昇。國民對政治消極，而同時要求現代政治，便是自相矛盾！

中國人在家長式的專制政府下過了幾千年。政府要人民馴良，馴良才容易統馭；人民要政府無爲，無爲才得到安居樂業。天高皇帝遠，百姓「封上糧」，便成了「自在王安居樂業」。人民對政治當然是消極的。因爲祇有對政治消極，方

能達到那種安閒的境地。這種傳統的態度，實成了今日我國政治上的最大阻力！這種阻力存在一天，現代政治便一天不得向前推進，更不用談從民衆當中能發出政治的原動力來！國民黨的衰老，共產黨的潰裂，原故全在國民對於他們過于淡漠。他們的失敗，不祇失敗在沒有國民熱烈地擁護，却同時失敗在沒有熱烈地反對與攻擊，失敗在沒有人注意與理會！他們整個是失迷了，失迷在得不到迴響的死寂中。這種境界實最可怕！

今後若打算使政治有生氣，入正軌，第一須先使國民知道對政治取積極的態度，然後再努力做到認真參政的地步。我們如不參政，便無政治可言。政治責任，正未容旁貸！熱心參政，在今日幾乎已成了做人的條件，正如在以前，仰事父母，俯畜妻子，是做人的條件一樣！

第二，國民須知與國家同証。這一點與前面一節是相互發明的。中國因爲素重個人自由，又因爲有長久的專制背景，所以很難感到政府與自己應是融和爲一的。我們以爲政府與我們是對立的。政府的權威與個人的自由是相消長的。政府權威的樹立，全仗個人自由的割讓；政府的權威大，個人自由便要小，政府的權威小，個人的自由方能大。我們所以始終容忍政府的存在，完全是由于兩害相權

取其輕。政府自身是壞的，但不要牠，却有更壞的來。所以我們始終是歧視政府的。

這種歧視政府的態度，我以為正是中國政府常與人民站在敵對地位的原因。人民歧視政府，政府自然要歧視人民。在這種情形下，出桀紂是常理，出堯舜倒是變象。論到現代政治，國民起碼須先打破這種敵視政府的態度。在專制下，帝王最多可以作到愛民如子，不歧視人民；在民國革命之後，我們却永須作到自己與政府同証的地步。『自治』(Self government) 本似含有一種矛盾，但這種矛盾非超越過去之後，不能算捉到自治的真詮。祇有將政事看成我事時，政事才當真能變成我事。英儒白克有一句常被入徵引的話說，欲使人民愛政府，須先弄得政府可愛。他這話自然是對當軸發的。我們若對國民講話就必須說，欲使政府可愛，須先去愛政府。靜等旁人弄得政府可愛是靠不住的，並且這個出發點從始即是錯的。我們現在應完全從另一端出發，我們起碼應與政府（政府自然不是指着某一時的行政領袖而言）同証，將政府看成是我們自己的！

第三，我們應將力量放在盡義務上面，而不應祇以追求權利為目標。我以為這不祇是 Birchback 的不同，這

是兩個不同的出發點。近年來國人都知道在那裏爭權利，爭人權。這種努力當然是可以為民衆造福的。但我們以為順着這一個方向走，至終是走不通的。我們在那裏爭權利，爭權利。爭到喜歡，爭不到便發脾氣。這樣爭權利，我們於是漸漸會以為政府有一個「權利儲藏庫」，我們伸手來討，當局不得已使拿鑰匙開庫，從裏面取出金黃的權利來。祇注重權利，祇看到權利，便很容易起這種誤解。到了這種謬誤的地步，實際上並得不到任何結果。這種祇知重權利而忘掉義務的錯誤，在一場革命之後，是常常犯到的。漸漸有人看到問題的另一面，才起來糾正。法國革命之後，曾將注意力全放在權利方面。不久，意大利的馬志尼便從利他主義的立場，竭力喚醒人要先盡義務。他說，法國革命由人權宣言出發，結局祇有出一個拿破崙的！這話很有深義。拿破崙的自私野心，實未始沒有時代背景的發展，由這種走錯路的不知有多少人！當盡的義務不盡，不當享的權利却要享，這已成了一種頹風。

實在的，民國已有二十幾年的歷史，我們竟還受到許多野蠻的待遇。那裏是我們的保障，那裏是我們的自由？先進國家在十七八世紀已不成問題的權利，到今天我們還

是類爭不得，這夠多麼可恥？是的，這話都含至理。但是我以為愈是這樣，愈須另闢一條新徑。我敢說，如果我們祇將精神放在爭權利上，我們永也得不到好結果的。我們須先曉得權利與義務是分不開的，權利離開義務是永不能實現的。固然我們不好說，義務比起權利，在時間上有在先性 (A priority)；但我們至少可以說，義務比起權利來，在邏輯上有在先性！未講權利，須先講義務！祇講權利而不講義務不但是沒意義的，並且是謬誤的。但若先講義務，不唯權利可不期而獲，同時還正可以成爲一個較健康的道德原則！所以雖然處在無民權可言的今日，我們也寧可隨着瑪志尼提倡義務 (Duty)，而不應仿效法國革命以抽象的權利 (Rights) 相號召！

論 走 直 道 兒

凡事，目不旁視的走直道兒，我們認爲是很危險的，走不通的。有時候本想到東，會走到西去的。這樣於人於己都不便而結果常不好的行徑，我們是應當少犯爲好。可惜，近來好些熱心可敬的人，專愛走直道兒，且以走直道

在上面我指出，國民對政治應取積極態度，國民須與政府同証，國民須先講義務；這三點實是一個整個的問題，痛改我國傳統的政治態度的問題。上舉三點如做不到，則一切現代政治不能談。不但民治不能談，訓政專政更不能談。沒有那種新的政治態度與精神，現代政治根本無由得到他的發動力。所以改造人民對政治的態度，實是急待解決的基本問題。

在國民方面我們自己須切記，做一個現代的公民比做一個真命天子下的老百姓，要困難百倍，千倍的！我們在今日須人人做自己的主人，須人人担負責任，須人人對政事助一臂之力。我們不能再想坐享太平，我們不能再袖手旁觀！我們政治的前途祇有我們自己才能決定，也祇有我們自己才有資格來決定！

壽 生

兒爲「好辦法」。我們爲敬愛這些熱心事業的人，爲希望他們進行的事業「實效」大些，不能不貢獻幾句不甚悅耳的話。

我們向人說我們從事的事業是很重要的，這是可以的

；但我們不能說唯有我們這事業是有意義，是復興民族的。我們對自己的事業了解得有些，要想給他以最大的發展，這是應當的；但因在那一點小天地裏，不一瞬其他的世界，只圖本身的發展而妨害他項事業，這是要不得的。這樣的走直道兒，瞎撞，徒費事，徒給中智下者以懊惱，中智上者以討厭罷了。

好些從事農村建設的領袖，「民衆」教育的學者在高喊，振興民族端在農村建設，恃禮而不恃法；高等教育如何如何的無聊。尤以梁漱溟先生的言論可玩味。建設農村，「民衆」教育，這是無疑的重要的工作。但建設農村是那麼簡單嗎？他們所需要的工具，是農村能自產的嗎？土壤，選種，導水，築路，衛生，風俗改良等問題，那樣不是需要專門學識的人才的？這些人才不藉高等教育嗎？高等學校又需要怎樣的環境？農村出產已豐富的時候，農產品不靠工業區，大都市嗎？有些問題，農村建設者一日研究出來的結果與現行政制要不相容，又怎辦？這不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嗎？這樣的問題，是走直道兒行的嗎？我們的社會，上上下下若沒有一致前進的要求，若不喚起一致前進的要求，孤軍深入，是不可能的。而我們正在人自爲戰呢！主市政的人，他要的是市的開展。主省政的人

，他怕的是省界的縮小。究竟於國於民便利如何，可不管。主郵政的，他期望的是年有贏餘，他忘記這是「國家事業」，竟好意思說出虧本是因印刷品增多，而想加運費，完全未意識到印刷品加多，正是辦「國家事業」者所盼望的，更未想到一切贏餘也是用來辦「國家事業」的。至於不論事實的是非，只以院別定議斥的，更叫人笑不得了。

近日北大發生的「停止軍訓」事件，更足說明直道兒之不可走。我是愛花些時間去參觀人下軍操的，那種有生氣嚴肅的空氣，很能給人一種振作情緒；所以我常到北大一院去看軍操。又因有好幾個朋友是北大的，所以我還知道一些別的內情。記得去年有一天早上，快收隊的時候，白雄遠先生訓話完了，問「各同學有甚意見沒有」？有人提議把時間提到五點半。白先生就問「贊成不」？雷吼一聲「贊成」！白先生說「當然益早益好，只是我們這裏面，有的是記者，有的是作家，還有種種工作忙，睡得晚的人，若太早了，他們受不住，我看還是六點好。——是不是？」——是！——白先生叫他們走東，他們不忍走西，秩序好極了。爲什麼呢？因爲他不是走直道兒的，真誠和藹，處處想得到，有一種力量吹勸學生樂意服從。今年的教官一來就懷一切「我就是我——軍訓。」「中央來的。」他志

記了學校也是中央的學校，中央是國家的中央，學生是國家的人民。他們對學校與學生都不免存一種猜疑的態度，首先向學校要求，要大學不常聽說的「訓育」權！這一點學校實無法讓他去「訓」，也就無法應許他。第二的要求是，軍訓鐘點不能排在「清早」！要排在普通學科中間，以示等重！且非如此不可！使我們奇怪軍操在清早不算精神。然而，這一來，把辦事員，教授，學生夠受了。請想想，三院是多少系，一系是多少班，是多少教授，又有多少教授是特請教一二的鐘頭的時間難更動？整個的功課表打翻了！愛走直道兒的先生，若看到職員，教授學生，在初開課的那幾禮拜的窘像，你們是會同情的。就舉馮祖荀先生那幾天的狼狽境地來看；今天甲生來要求改下午五點，明天乙生要下午一點；甲班要求星一，乙班要求星二。這位數學家，也算不過來了！今兒改，明兒改，後兒還得改；三次才算湊合適。在最末一次，他被一些可憐學生哀求得無法，跑去拉一位同樣可憐的職員來，急得話都說不清的：「左改右改，看要把我弄到怎麼樣。請這次把我排定的，好不好！」天，一個「人」一天就來應付改鋪點完事嗎？那麼，學生就算真是些搗亂鬼，不值得惋惜嗎？局外人那里知道他們的苦衷。就拿化學系二年級來說：一個星期上課

六天，天天有實驗，而實驗的是定量分析，有機，高等無機，每個實驗都要幾個鐘頭，甚至有一整天弄不好的。他一開手就不可離開，要細看牠的變化。顏色看走一點錯了。數目量錯，算錯一絲絲，空費力了。他們常常吃飯的時候都趕不上。至第二外國語加緊，別的等等那用說。然而軍操的時間是下午一至二或二至三，正是他們要去實驗室的時候！走直道兒的先生們，這些可愛的青年，就算鐘點不衝突，看着他們一放下槍一面抹汗一面氣咻咻的跑進實驗室去，受那各樣藥品氣味的侵襲，能不動心？在這各方忍耐，操作得剛有個眉眼的時候，「停上軍訓」了！「我們」是與「他們」站在同一立場的，是希望他們得一點軍事常識「同心」來應付國家的空前大難，並不是要同他們取對敵的形勢，苦他們的呀！更豈能因一人一時的不高興，而突然停授千餘學子的課程！退一千步說，討厭某年級的「一班」，就決定了全校的命運嗎？這是國民軍訓的本意嗎？走直道的人哪，你的熱心可愛，你們處理事件的態度是多令人可惜。

我們這個困難的時代，所需要的是相互的了解，相互的愛顧，相互的容忍，相互的體諒；個人的任性，自高，濫用權力，快意，是不需要的！是辦不通的。自以為認清

時代，勇於負責者，何妨反省反省。

「單絲不成線」這是一句很真切的話。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出路，絕不是今天想起需要這樣，就生拖活扯都來做這樣，明天想起那樣，又那樣，所能期達的。胡適之先生有幾點鐘的課就是在黑的時候，不知的又將認為是「不重要的課」了，那晚這正是胡先生講學的號召力大，這時候方能多使些人得旁聽的機呢。在北大，凡是講學能力大的教授，都是常有別系的人去聽的，校外的人也有。這正是北大偉大處，北大學生的偉大處，「沒大學生的資格？」自以為有能力「訓」人的人，最好要明白「自治力」是何意義。

政府近在江西有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口號。德國在大

解決中國經濟問題應走的路

賀 嶽 僧

二三，十二月，五日。

很明顯的，關於怎麼挽救中國經濟衰落的危急，現在有兩派不同的主張。一派是主張復興農村；一派是主張開發工業。主張復興農村者，我可以名之為向後倒退派；主張開發工業者，我可以名之為向前推進派。這兩派的思想，有一根本不同之點：即前者是改良，後者是改造，即前者

戰前後有頭腦動員的吶喊。蘇俄有工人突擊隊的稱謂。日人近有心理國防之說。英國顧慮澳洲的安全，來一個看去好似好玩意的航空競賽。斐希德補國恥而組柏林大學。吳俊升敢竟提出一個難教人寓目的「教育與哲學」的問題。這些，這些，愛走直道兒的人其實是宜思想的。要有人說，傻瓜直道兒不走，要去兜圈子嗎？敬答曰，偏要「說」走直道兒也可以，但得這樣：各方面都觀察清楚了，然後認定一條必走的路線猛勇走去。這是真正直道兒，這才是努力民族復興的人們邁進的康莊。在這路走的人們，是協力的，不是對敵的。阿們！

認定中國經濟的所以衰落，是因為不努力的自然退步；後者則認定這是產業革命期中的當然現象。換句話說：是受「優勝劣敗，適者生存」自然律的支配。將其認識之點不同，所以挽救的方法遂不能一致。代表前一種主張者，則以梁漱溟高踐四兩先生為代表；代表後一種主張者，則

以獨立評論上所發表的意見爲最多。就我個人言：則很開門見山的，是贊成後一派的主張，其所以贊成這派主張的理由，則除了吳景超先生在「我們沒有歧路可走」那篇文章中所列舉以外；尚有幾點補充的意見。

第一：社會上每一問題的發生，必有其發生的主要原因，因此我們要想解決那一個問題，就必須追溯到這個問題癥結之所在，假使這一點沒有找清楚，那當然是藥不對症。固然中國農村經濟之所以由衰落到趨於崩潰，其原因是很多，可是最主要的，是受了外來的新的生產方法輸入的影響。依一般的說法，是受了帝國主義者經濟侵略的影響。其它如稅捐繁重，匪共騷擾，政治不良，都是在這主要的原因下所附帶發生的現象，因爲現式的帝國主義，是由資本主義演變而來，資本主義之所以完成，是因爲應用優良的生產技術，技術優良，則所需要的原料增多，所生產的貨物加鉅，需要增多，本土不能供給，貨物加鉅，國內不能消納，在此種情形之下，乃不得不以侵略的方式，向海外尋覓殖民地，達到攫取原料，發展市場的目的，被其攫取發展的國家，在這被侵略的過程中，遂陸續不斷的發生外禍內亂種種的事變，所以說，帝國主義的侵略是因中之果，而產業革命才是果中之因。假使現在泰西各國，

也是如中國一樣，是採用舊式的手工生產方法，則現式的帝國主義根本不會完成，現式的帝國既不能完成，則經濟侵略的力量自然無從發生，即使侵略，亦不過是武力侵略而已，於被侵略國的經濟組織無多大影響的，何況現式的武力侵略，也是要建立基在優良生產技術之上的，沒有優良的新式交通戰爭器械，要想征服一個遙隔重洋的國家爲其屬地，也是不可能的。這個理由，我們無須舉旁的例証，單看歷史的事實就夠了，歷史的事實告訴我們，中國在漢唐時代，即已與鄰近的各國發生國際關係，在那時候，雖然彼此常不免互相侵略，但其侵略的目標，却不過是耀武揚威，使對方上表稱臣而已，從沒有帶有經濟的性質的。爲什麼呢？因爲當那時候，彼此的生產方法相同，誰也沒有具備了經濟侵略的條件，誰也沒有具備經濟侵略的可能與必要。足見經濟侵略事實之所以發生，不完全是武力侵略的結果，而是優良的生產技術所促成，至少在中國今日的情形下，可以如此解釋的。既然是如此，那末我們現在所要抵抗的，就不完全是帝國主義，而是促成帝國所以發生的優良的生產方法，然而這是絕對非舊式的手工生產業所能抵抗得住，惟一的辦法，祇有迅速的完成產業革命，換句話說，即迅速的利用機械生產來代替手工生產。羅素

在中國的演講集中有云：「生產落後的國家，產業的開發，祇有兩條路可走，一是用自己力量來開發國內實業，一是讓外人來開發，日本與俄國所走的是前一條，印度與其他殖民地所走的後一條路」，中國究竟應該走那一條路呢？這是容易看出來的。

第二：高唱農村復興運動者，還有個似是而非的理由，就是說：農業生產，是最基本的生產，因為農業的主要產品，如糧食，如動物的肉類，都是維持生活最必要的物資；如棉花，如樹木，如獸皮，都是供給工業製造所必要的原料。至於工業製造嗎？則不過是利用農業所生產的原料，變更其形態，擴大其效用，以便利於人們生活的。這種便利人們生活的工業產品，有之不爲多，沒有亦不爲少。沒有火車輪船以前，人們可以用帆船手車爲交通利器，沒有發明機械紡織業以前，人們一樣的要穿衣服，沒有高插雲霄的西式房屋以前，人們亦有茅舍草廬瓦屋平房可避風雨，沒有電燈以前，人們用桐油牛油燈還是可以度過漫漫的長夜，所以凡屬機械生產品，都是可有可無之奢侈品或半奢侈品，不如「歸真反璞而民不爭」。惟有農業生產物，則爲維持生活所必不可缺少的資料，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因此他們最後的結論是如此，即使以發展工業爲目的

，也必須以振興農業爲手段，不然則「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基本的生產且不能維持，便利的欲望更何從滿足，於是便所謂農業立國之論調發生。所謂農業立國者，如章行嚴氏的解釋，「凡國家以其土宜之所出，人工之所就，即人口全部，謀所配置之，取義在均，使有餘不足之差，不其相遠，而不擾國外之利益以資挹注者，謂之農國，反是：則爲工國，建國之本原既異，所以政治道德法律習慣，皆緣是而兩歧，農國講節欲，勉無爲，知足戒爭，一言蔽之，老子之書，爲用極宏，以不如此，不足以消息盈虛，咸得其宜也」。此種議論，原是繼承農家的思想，許行與孟軻的辯難，漢代重農諸詔令，與乎流俗諺語所云「三山六水一份田，九份閩人一分耕」，把一切非直接從事耕種者視爲閩人，都是持着這種理由。這種理由，在表面上好像能够自圓其說，其實則完全認錯了時代，忽視了人類所以進化的原則，忽視了分工的利益，忽視了供給與需要的相互關係，更忽視了產業革命所給予大多數人類的福利，祇看出它不好的影響那一面。我們知道，人類自從動物演化而來，在原始時代，人類的的生活，是「茹毛飲血，穴居野處」與一般的動物無多大的殊異，其所以趨於進步的原因，完全是欲望的向上發展運動機所促成，發展欲望最具

體的表徵，是物質生活的要求，由簡陋以趨於繁複，由狹素以趨於舒適，假使是安於現狀的話，則人類將終於野蠻，永遠不會進化到現有的程度，既已進化到現有的程度的時候，我們的要求，還是應該無止境的，所謂「知足無爲」，都是自安於懶惰，自甘於退化，不足爲訓的。中國受了這種學說的影響，已經是退化了，現在唯一的自救辦法，祇有勇猛的向前努力！祇有增加我們克服自然的力量，祇有促進生產技術的改良，何況環境的要求，又不能容許我們安於現狀，安於現狀，就無異坐以待斃！立足在這個基點之上，那末現在中國的問題，就不是什麼復興農村可以解決得了，而是要儘量的採用機械生產方法，以應用於一切生產事業，以促成整個生產事業的繁榮。因爲機械生產，比較手工生產，無疑的效率是要大些，無疑的質地是要優良些。在古代的時候，因爲技術的笨拙，效率的低微，以致人們費了全部的力量，僅足以維持必要的生活，僅足以避免饑寒凍餒，所以沒有方法，漢代諸帝祇好鼓勵多數的人民，從事於農業，賈誼，董仲舒，賈山，桑弘羊這一派人，祇有鼓吹「大利在農」的學說。現在已經發明最優良的技術了，祇要我們肯應用這種技術，則以全國百分之二三十的人力來從事於農業，即可供給全部份人的生活

而有餘，美國的農民人數最少，而農產品常苦過剩，就是一個例証。可見中國的糧食之所以缺乏，不是因爲從事於生產的人數太少，而是技術笨拙，方法不良，既然是如此，那末現在要增多農產品，就要從改革農業技術着手，技術改良後，從事於生產的勞動力自然有多餘，移用這些多餘的勞動力，以作開發工業之用，這是增加生產解決失業問題的良法。同時就供求相應的定則言，工業所消耗的原料多，即可以間接的促進農業發展，南通本不出產棉花，因爲有幾家紗廠的需要，始成爲全國產量最豐富產品最優良的棉場，這樣看來，農業與工業，是互爲目的，互爲手段，而不是偏於一方面了。

第三：高唱農爲邦本者，還有一個理由，是維持國內的民食，抵制外糧的傾銷，這是不錯的。可是在我們看來，在這個目的之下，如果不以改良農業技術爲手段，則外糧的傾銷，依然抵制不了，國內的民食，依然維持不住的。爲什麼呢？因爲現在的生產，不是可以超然的自給自足，而是必然的要受市場價格影響而消長的，我們儘管不以「攫取國外之利益以資挹注」，然而現在的問題，不是我們攫取不攫取，而是外國要來攫取，我們沒有方法抵抗。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要想使生產圓滑地進行，要想使多

數人自動地從事於某種生產，則務必使那種生產事業是有利潤可圖，務必使那種生產物在競爭市場中不立於必然失敗的地位。假使不能如此，則生產物在市場的競爭中，不特無利潤可圖，反須折耗成本，折耗成本的企業，是誰也不願意經營的。這幾年來，我國農業生產品之所以萎縮，農民之所以紛紛奔赴城市中另覓工作，紡織廠之所以關門，都是這原因所促成。外國是機械生產，用力少，成本輕，出品良，賤價出售，還有利潤可圖，中國是人工生產，用力多，成本重，出品劣，敵不住外貨的傾銷。關於這一點，我還可舉個更顯明的例証，在十年以前，我們湖南鄉村所用的紗布，完全是農家婦女自己紡織的。現在呢？則手紡織機，大半已束諸高閣，鄉村婦女，遠遠地跑到上海去找紗廠的女工作，鄉下人所着的是洋布，所用的是洋紗，爲什麼呢？因爲自己費了許多力量，最後計算，還不如

購買現成的紗布來得便宜。由此類推，與其自己耕種，還不如買現成洋米洋麥來得便宜，所以惟有有利可圖的事業，才可以吸引人們的努力，除此以外，別無其他方法了。而高唱復興農村運動者，仍然想鼓勵農民以手工生產去與機械抗爭，真可以說是「番蜂蠅之臂，禦隆車之燈」，多見其失敗而已。

基於上述的幾點，所以堅決地相信，中國現在所需要的，是改造不是改良，是前進不是後退，是推廣優良的生產技術於一切生產事業，不是保守主義的復興農村計畫，這是挽救經濟厄運的惟一辦法，這是走上近代化的惟一直道，政府當局，應該朝着這個方向進行，智識階級，應該朝着這個方向去努力！

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寫於武昌

雙週閑談 (五)

明 生

探求某種社會現象的原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雖然現在討論如何解決社會問題的文章，洋洋數千言，好像說的條條是道。這個不容易的緣故可以分爲兩層來說。一則一個

社會現象的原因常不是一個或兩個，常有無數個，而每個的輕重，每個成分的多少，也不相同。有時甚至於同一社會現象而所以致之之原因也許完全不同。再則既使原因都

尋到了，都確定了，但原因之上還有更後一步的原因，這些後一步的原因是否也應該認為原因呢？這僅是極粗淺的說法，但我們所要注意的就是人事上的因果關係比較自然界的要複雜的多，不容易捉摸。人類至今對於許多的社會現象，還在那裏捉迷藏。世界各國的不景氣，至今還沒有辦法（當然也有一部分是有辦法而不辦的），就是一個極好的證明。

前幾天一個朋友提到男女感情生活在東西洋不同的問題，這正屬於社會現象原因的問題。他說，何以男女的感情在西洋占這樣重要的地位，在歐美的文學上，美術上，實際生活上，兩性間的愛與恨成了最主要的內容。何以在東洋，一直到了最近，簡直沒有地位呢。假使這個問題可以成立——也許有人根本不承認性愛在東西洋的地位不同——這倒是值得探討的。如前段所說，這不是容易的事。我現在且把我對於這問題的一點意見寫出，供大家的討論。至於真正系統的科學的檢討，還有待於專門歷史或社會學的人們。我既然提出社會原因複雜的警告，現在不能反對自己主張，大膽的認為下邊所說的已經把這個問題解決了。

所謂東洋，範圍太廣，我不敢說。至少在中國，兩性

間的情感所以未能發達的主要原因，我以為是家族制度。中國家族制度的觀念是家族的綿延。每個人有一個家族裏，按着他所居的地位，如做父親，做兒子，盡他的本分，孝親，慈幼，使香烟可以永遠不絕。在一個家族團體裏，有許多的關係，如父與子，母與子，兄與弟，姊與妹，等等。夫與妻當然也是這種關係的一種。但是因為夫婦的關係不過是綿延家族的一個方法，所以兩性間的情感是不必管的。況且夫與婦各人有各人在家族裏的地位與本分，這個情感的有無，更是不必計較的。如果兩人發展情感，或者反妨礙他們在家族裏盡他們的本分。所以古人力戒夫妻的親暱（如舉案齊眉，夫婦之間無戲言），更忌聽妻之言，以傷害手足的感情。

這祇說家族制度使夫妻間的愛情不存在，還不能說明一般性愛的不存在。關於後者，當然是由於中國的習俗不許男女接近。沒有刺激不會有反應的。根本男子沒有與女子見面的機會，性的感情如何會發生？幸而還有娼妓制度，有些人因此得有機會與妻以外的女子接近，所以至今還有幾首值得一念的愛情的詩。但男子與妓女的關係總是不自然的，帶着商業性質的。健全的，高尚的愛情不能希望由這樣的關係發生。至於如張君瑞的經驗可以說是例外的

例外，但後世仿西廂記之作差不多全是想像的，毫無實際的詩詞。這一點：中國文學上愛情的表現，比較西洋的，無論質量，都微小的可憐。我們想到二三千年家制制度與男女防閑的壓力之下，居然還有時在文學上發些性愛的星火，還應該驚奇呢。

西洋在希臘羅馬兩個時期，兩性間的感情並不見有若何的表現。當時的男子忙政治，忙軍事，大概性愛還不值得費他們的精神。當時女子的本職就是做管家婆（如阿里斯脫芬內斯在 *Lysistrata* 一劇中所描寫）。古代的情形且不必談。最奇怪的是歐洲在中世紀以後，性的感情忽然的發達起來。這個問題在一方面看來，是在中國所有的限制性愛發展的條件不存在。在另一方面看來，也許還有促成他發展的條件。我想這個主要的條件就是基督教。基督教以愛為他的教旨，雖然他也曾引起許多的戰爭與屠殺。兩性的愛與基督教的愛雖然不完全是同，但是由後者轉化到前者是很容易的。況且從人的實際生活方面看來，

愛他所能見的，所真喜歡的男或女，比較愛他所能不見的，具有抽象性格的上帝，當然更為方便。聖母崇拜也容易給戀愛的男子一個極高潔的對象。中世紀武士制保護弱稚的婦孺的信條對於性愛的發展似乎也有貢獻。婦女變成了應該憐憫的對象，如果條件充分，由憐憫到愛情極快便走到了。有愛的宗教濶漫了全歐，有武士制保護婦女的信條成了社會的風尚，同時缺乏限制的條件，無怪乎兩性間的感情在西洋便永遠滋生，變成人生必不可缺的一方面了。

最後我們還應該看出「表現」在東西洋的地位的不同。中國對於感情的表現，絕不鼓勵，所謂「禮」完全要將真正的感情壓住，做出定型的行為。歐洲在希臘時代起始，便重表現，他的文學，藝術運動都是表現的大成績。中世紀的時候，表現的風氣一時不振，但到了文藝復興時代，又成了表現復活，大活躍的時期。結果他產出文學，藝術，探險，科學。這種表現的風氣無疑的也助成了兩性情感的发展。

編輯後記

道 之

△王子建先生是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院的研究員

，他論「棉紗統稅」一文，立論很不允，很值得財政當局

局的注意。

△張佛泉先生是大公報和國聞週報的記者。現在北京大學政治系做講師。

△有人說，北平的沙灘一帶，從北河沿直到地安門，可說是北平的「拉丁區」。在這裏，有許多從各地來的學生，或是預備考大學，或是在北大的各系「偷聽」，或是自己做點專題研究。北大的「偷聽」，是一個最有興趣的制度：「旁聽」是要考的，要繳費的；「偷聽」是不收的，不註冊的，不須繳費的。只要講堂容得下，教員從不追究

這些為學問知識而來的「野」學生。往往課堂上的人數比點名冊上的人數多到一倍或兩倍以上。「偷聽」的人不限於在沙灘一帶寄住的學生，其中也有北平各校的學生，但多數是那個「拉丁區」的居民。——「壽生」先生也是這一個「拉丁區」的一個居民，他這篇「走直道兒」裏就用了不少關於北大的瑣事做材料。他在「拉丁區」裏聽來的輿論，得來的觀察，也許是我們大家都樂意聽聽的罷。

△賀綠僧先生是湖南人，他這篇文字是響應吳景超先生的「我們沒有歧路」（獨立一二五號）的。

◎本社啟事

本刊第一〇一號至一二五號目錄，現已印好。凡定閱本刊者，隨本期附贈。函索附郵票一分。

本前 三號 目

第一一八號	記全國考銓會議 農村運動之今日 兩性問題與社會意識 日德同盟嗎？ 歐游隨筆(四) 不景氣的城市 編輯後記	胡適 章元善 衡哲 胡道維 胡廷獻 余之件 編者	第一二九號	蘇俄的青年 歐游隨筆(五)蘇俄的英雄 評憲草 雙週閑談(四) 編輯後記	西臺 職業指導的重要 蘇俄外交的一個觀察 陳之邁從江陰到青島 明生關於模範縣 中國的地理基礎(書評) 適之編輯後記	胡適 周先庚 叔永 徐中玉 李俠文 洪恩齊 適之
-------	------------------------------------------------------------------------	--------------------------------------------	-------	-------------------------------------------------	-----------------------------------------------------------------------------	--------------------------------------------

獨立評論合訂本

第一冊(第一至第二五號) 第二冊(第二六至五十號)

第三冊(第五一至七五號) 第四冊(第七六至一百號)

每冊價目：

甲種(布裝)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布裝)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紙裝)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掛號照加)

獨立評論 第二三二號 編輯後記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有「社會新聞」、「外國通訊」、「經濟界」、「教育界」、「計開欄」等。每份售價五分，並有「每週一」及「每週五」兩種，每份售價五分。本報印刷精美，其內容豐富，為平中樞之選。

（本市）每月一元一角
（天津）每月一元二角
（漢口）每月一元二角
（香港）每月一元二角
（上海）每月一元二角
（廣州）每月一元二角
（北平）每月一元一角
（保定）每月一元一角
（石家莊）每月一元一角
（濟南）每月一元一角
（青島）每月一元一角
（長沙）每月一元一角
（重慶）每月一元一角
（成都）每月一元一角
（西安）每月一元一角
（蘭州）每月一元一角
（西寧）每月一元一角
（昆明）每月一元一角
（貴陽）每月一元一角
（海口）每月一元一角
（台北）每月一元一角
（台中）每月一元一角
（台南）每月一元一角
（高雄）每月一元一角
（基隆）每月一元一角
（新竹）每月一元一角
（嘉義）每月一元一角
（屏東）每月一元一角
（苗栗）每月一元一角
（桃園）每月一元一角
（新竹）每月一元一角
（苗栗）每月一元一角
（桃園）每月一元一角

民間

半月刊 第五十期出版

二十二年民校畢業成績 諸葛龍
山東省之實驗區工作 屈凌漢
民衆教育 王向辰
半瘋（小說） 賈席珍
利用煤油箱制一切用具 記者
農運情報 記者

簡評
勞作展覽 河北省政府新聞
各庚款委員會 中央與地方
中面蕭條誰負責？ 吳景超先生來信
編輯後記 記者

優待直接訂定本年內
預定全年按定價八折
實收六角四期滿以後
決不再延定閱諸君務
請諸從速
北平石驢
馬大街二
十一號
民間社

第五卷 外報 第五期

中華民國誕生初期之外交 張維
薩爾問題始末（續五卷四期） 蔡維
歷次抵制日貨的經濟效力 許興
日本貿易的分析 陸東
蘇聯加入國聯事件之探討 林
蘇聯之軍事（續五卷四期） 民
蘇美關係述 卓
我對英法美三國之觀察 于
蘇聯之和平外交政策（通信） 仲
蘇聯入盟後李特維諾夫之首次演說（通信） 譯

目價
零售：每册大洋四角
預定：半年六期全年十二期
內貳元肆角國外肆元柒
元
社址：北平府右街中海外
報社

鄉村建設

第四卷 第九至十一期 要目

社會教育與鄉村建設之合流 梁漱溟
寫給鄉村教師 周文山
鄉村建設幾個當前的問題 梁漱溟
丹麥教育家與梁先生的對話 李星三
鄒平的縣學師範部 張石
本院農場改良脫字美棉推廣報告 喬政安
參加鄉村工作討論會記 李說西

本刊優待長期訂閱
自三四卷起減低定價
（全年三十元一期一元五角五分）
（郵費不並收）
（代郵票）
（零售每份四分）
發行所
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出版